

【主持人语】(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院长、上海公共外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公共外交译丛”副主编刘芹教授) 公共外交是国家外交大局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上海处在我国对外开放的最前沿,开展公共外交工作大有可为。2020年9月,上海公共外交协会和上海理工大学合作共建上海公共外交研究院,旨在挖掘各方优势,加强多元合作,携手提升公共外交工作的实际成效。在党的二十大召开之际,上海公共外交研究院翻译的国内首套“公共外交译丛”正式出版,标志着公共外交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出版版图更加完整,将有力助推我国公共外交翻译工作和公共外交事业的发展。

8月16日,上海公共外交研究院隆重举办“公共外交译丛”新书发布会。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上海公共外交研究院专家咨询委员会主席、丛书总序作者赵启正,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公共外交研究院理事长、丛书主编周汉民,上海市政协对外友好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上海公共外交研究院理事、丛书副主编祝伟敏,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公共外交研究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丛书顾问冯绍雷等莅临现场。

本专栏收录了上述四位领导和专家在“公共外交译丛”新书发布会上的讲话,以及《城市外交:当前趋势与未来展望》和《公共外交:数字化时代全球公共参与的基础》的译者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翻译硕士教育中心主任王勇教授和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陆泉枝博士的翻译感悟,以期为我国公共外交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提供参考。

## 上海公共外交研究院新书发布会上的讲话

赵启正

很高兴出席上海公共外交研究院和上海人民出版社主办、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协办的“公共外交译丛新书发布会”。

近几年来,大家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随着中国逐渐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宣扬“中国威胁论”来遏制中国发展,从而转移其国内矛盾,稳定政治局势,导致中国在国际舆论中被误解、被孤立。在这一形势下,中国的媒体、智库、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乃至个人都应当参与到公共外交中来,从而加强“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力量。达成这一点的前提是让更多的中国人具有公共外交意识,了解其基本概念以及参与的重要性和自身的使命感。

美国是运用公共外交的老手,他们不断观察别国的公共外交发展,同时积极提升本国的公共外交实力。

举例来说:2011年2月15日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卢格发布了《美国对中国的另一项逆差——互联网时代的公共外交》的报告。这个报告仔细研究了中美公共外交的差异。报告认

为,中国人透过历史看待的中国与世界人眼中发展的中国并不相同。报告妄言,中国用尽所能阻碍和限制美国的努力,并用其软实力赢回地位,凌驾于世界各国之上。中国的方法确实比其他国家的方法奏效,现在中国推行公共外交政策资源充足,信心满满,其任务已经转为重塑中国在世界形象。

报告还称,中国认为世界强国是他们应有的地位。为了重振雄威,21世纪的中国避免形成富有侵略性的国家形象,唯恐受到世界各国的联合反对。为此,中国依靠4000年的文化历史作为公共外交的核心思想,表现出沉稳的、内向的、不具威胁的国家形象。中国的公共外交尽管看起来很集中,但其实中国将公共外交分散给三个独立的政府机构:国务院新闻办(负责“软实力”)、外交部(负责正式的公共外交)、教育部(负责“汉办”)。

10年后的又一个案例:2021年12月,美国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ACPD)发布了题为《将政策和受众放在首位:公共外交范式<sup>①</sup>转变》的报告,披露了美国自1999年开始的“公共外交人员配备计划”。这个计划的内容是针对全球通信基础设施

更新迭代,公共外交目标范围扩大的现实,对美国大使馆的公共外交部门、文化新闻职能部门进行重组,重新进行人员配置,实现公共外交的数字化。更重要的是,它不是根据部门布置外交任务,而是对受众群体进行细分,有针对性地设立工作群组,并且从2013年开始对公共外交运作情况开展实地审核,这相当于对公共外交实践进行一场“大修”。这些新披露的公共外交策略都值得我们关注并保持警惕。

我国公共外交的理论和实践与西方存在一定的差异。美国的公共外交是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推行文化霸权的工具,粗暴干涉别国的内政,甚至挑拨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充满竞争意味。而中国的公共外交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其重点在于更好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介绍中国的真实情况,争取世界各国对中国梦的理解和支持,力促“融通中外、增信释疑”。

面对西方长久地制造和传播“中国威胁论”,恶化我国的国际形象,我国加强公共外交是一项关系到国家主权、和平、安全、稳定的战略传播的大事。随着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区块链(Block Chain)、云计算(Cloud Computing)和大数据(Big Data)等的加速发展,各国公共外交出现新特点,即把技术扩散与价值观传播绑在一起,这引发了不同文化和价值观念之间前所未有的交流与交锋。

我国的公共外交实践,一方面应当用心跨越文化藩篱,注重表达方式的国际化和艺术性,做到“中国立场,国际表达”,也就是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用国际上能够理解的方式,真实地对外表达自己;另一方面,在一些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敏感问题上,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针对目标受众澄清事实,塑造共识。

本人曾将公共外交定义为:政府和公众(包括社会组织、企业、媒体和个人等)从各自角度,向外国公众(也包括公职人员)表达本国国情,说明本国政策,回答关于本国的问题,同时了解对方观点的国际交流活动。我注意到,西方国家把我国的公众作为公共外交的对象。但是在中国,公众也是公共外交的重要承担者,中国文化的家国观赋予了我国公众这种使命。可以说,“公共外交,匹夫有责”。“故事驱动中国”,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中国

故事的自觉传播者,自己传播自己的故事效果最好。公共外交活动不只是说,还要善于听,“说听并重”,才能说得更有针对性。西方国家的公共外交与我国公共外交的重要区别,是我们研究西方公共外交的一个重要的着眼点。

我国公共外交实践和理论创新的前提是知己知彼。我们需要洞悉欧美世界的公共外交实践及其背后的理论支撑,同时充分关注各国政治传统的差异和人民价值观的不同,保持理论的开放性,在此基础上构筑我们的理论大厦。遗憾的是,我国在海外公共外交著述的翻译和研究方面存在较大的不足,除了日本北野充主编的《公共外交:“舆论时代”的外交战略》和英国詹姆斯·帕门特(James Pamment)的《21世纪公共外交:政策和事件的比较研究》等之外,我们鲜少能够读到用中文译介的域外公共外交著作。

在此形势之下,上海公共外交研究院携手上海人民出版社,系统性地遴选、翻译国外公共外交领域的知名著作,出版国内第一套“公共外交译丛”,正当其时。经过研究院和出版社的共同努力,我们迎来了“公共外交译丛”的开篇之作《公共外交——数字化时代全球公共参与的基础》和《城市外交——当前趋势与未来展望》的正式发布。在此,我谨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向陆泉枝和王勇两位研究院的译者表示衷心的感谢!我相信,这套“公共外交译丛”将多维度、多层面地展示国外公共外交的最新研究成果,拓展中国公共外交参与者的全球视野,为我国公共外交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最后,祝贺上海公共外交研究院和上海人民出版社主办、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协办的“公共外交译丛”新书发布会取得圆满成功,使该套丛书登上了中国公共外交大舞台,期待大家不断做出新贡献!

谢谢!

(编辑:朱渭波)

①范式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理论体系。库恩指出:“按既定的用法,范式就是一种公认的模式或模式”;“我采用这个术语是想说明,在科学实际活动中某些被公认的范例——包括定律、理论、应用以及仪器设备统统在内的范例——为某种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了模型”。在库恩看来,范式是一种对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本承诺,是科学家集团所共同接受的一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这些东西在心理上形成科学家的共同信念。